

上海教师

《上海教师》丛书 卷一

主编 刘国平

刘京海和他的 “后成功时代”

张汝伦 教育、人文和人文精神

于漪 教师的“心累”

金忠明 葛大汇 唐安国 教育公益性再讨论

刘京海 顾骏 20年后再谈“成功教育”

张民生 成功教育的成功在何时前进

顾冷沅 台湾之路

顾晓鸣 书海无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教师》丛书·卷一

刘京海和他的 “后成功时代”

主 编 刘国平

副主编 周家明 陈雪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教师》丛书

顾问

胡正昌 姚庄行 吕型伟 刘期泽

《上海教师》丛书专家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漪(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会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王厥轩(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研究员)

尹后庆(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邓伟志(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

陈玉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金志明(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总编辑)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授)

顾泠沅(上海教育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顾 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碧美(香港大学副校长、教授)

袁振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委会主任

吴圣苓(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社长)

黄良汉(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秘书长)

夏玲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会主席)

编委会副主任

高洁敏(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党委副书记)

史国明(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秘书处处长)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王小柳 王立强 王伟鸣 王懋功 毛长红 孙惠明

李学红 刘国平 杨国顺 沈卫国 陈宇卿 周国明 陆建国

竺建伟 赵连根 徐界生 徐 虹 倪 明 唐海宝 顾 锋

顾筱璞 楼伟俊

主 编 刘国平

副主编 周家明 陈雪良

编 辑 姚子明

上海教师

徐匡迪

编辑出版了六年的《上海教师》丛书，今年改版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讨论改版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学习了八年前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同志的一篇演讲稿《今天，我们怎样做老师》，感到很亲切。徐匡迪同志关于“教师要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教师要发挥人格力量的引导作用；教师要用爱心去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的论述，至今发人深省。年初，我们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同志为《上海教师》丛书题字，他欣然答应。不久就收到他的题字，我们深受鼓舞，增强了进一步编好《上海教师》丛书的信心。这次改版，得到了教育界、文化界许多专家的支持，出任丛书专家委员会委员。我们将努力把丛书办成融学术性、知识性与实践性于一体，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平台，成为广大教师喜爱的一本读物。

编者

2008年2月

目录

- 2 教育、人文和人文精神 / 张汝伦
- 13 教师的“心累” / 于漪 张治 等
- 19 教育公益性再探讨 / 金忠明 葛大汇 唐安国

- 27 刘京海和他的“后成功时代” / 周慰
- 44 20 年后再谈“成功教育” / 刘京海 顾骏
- 54 “成功教育”的成功在于与时俱进 / 张民生
- 57 我看“成功教育”的意义 / 顾筱璞
- 59 论“成功教育”的人物基础与思想突破 / 陈军
- 65 深化教育改革需要“经营理念” / 宁本涛
- 67 我心目中的刘京海校长 / 高纪良
- 69 “穷人”的教育家刘京海 / 刘国平

- 71 创建教与学电子平台的研究 / 刘京海 陈德华

- 78 名师之路 / 顾泠沅
- 82 重塑教学文化 / 乐震
- 84 构建生命课堂 / 丁莉莉
- 86 作文的情与理 / 宋林正
- 88 黑白琴键 多彩人生 / 林荫音
- 89 “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 申叔时

- 95 “旧文”大可“新读” / 司马牛
- 96 成器乎？成人乎？ / 孔子撰 谷平 雨石注释
- 101 我的“著书”经历 / 赵志伟
- 104 2008年，我们该怎么理财 / 降雨
- 107 书频道 / 顾晓鸣



教育、人文和人文精神

复旦大学 张汝伦

提要：

● 我国古人向来有一个话题，很简单，叫做“知书达理”。《论语》第一章就是“学而”，讲的是人为什么要学习。我国古来把培养人、培养人的人格，放在第一位的。

● 近代以来，教育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受西方列强欺凌，国势危急，人们以为要救国，就要学西方，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这开始，中国教育向实用方向转化。

● 当今教育观念的问题，固然有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但肇始却在晚清。教育理念走到今天这一步，看来不可避免，似乎是必然的。

● 教育问题是我们一个很揪心的问题，非常揪心的问题。

● 我们在当今情况下讲素质教育，整体上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只有少数真正不把市场需求放在心上的人，才会真心诚意地追求素质教育。

● 人文精神不是行为规范，而是设定行为规范的最后标准，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天理良心。

● 我们不光教知识，而且要教文明。不在中小学阶段讲清楚人生为了什么，人如何跟他人打交道，人如何跟自己打交道，人如何善待自然，学生们走上社会后，怎么生活？

现今，教育问题是一个很揪心的问题

我觉得，中小学教育的确是人生当中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一环。如果说我们把教育比作一个人人生必不可少的环节，大学已经是到了最后一环，大学教育对一个人的人格培养来说，等于是守门员，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积极的東西的培养是要在更早的时候。

现在，有些大学生不知怎样与老师讲话，给老师写信，没有台头，

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的时候更是岂有此理!要考研究生,一上来就是:“你们这里今年考哪几门课?有什么参考书,还有没有?”底下也没有落款,好像给老师下命令一样。前几年生命学院一个团支书给我来了这么一封信,也没有台头称呼:“我是生命学院的团支书,听说你演讲不错,我们交个朋友吧,马上你到我们这儿来讲讲话。”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这也不一定是这些学生没教养,可能我们在中小学时真的从来没有一门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与老师讲话。比如有一个《复旦青年》的学生记者来向我约稿,要我给他们学习我的《〈论语〉导读》的优秀论文写一篇评语,几月几号交稿。我说,你这不是商量的口气,而是给老师下命令。我就是这样的人,有时也会不客气。我说:对不起,你这不是对老师讲话的口气,你作为一个记者,将来要走上社会,你要学一学如何与别人讲话。他还不承认,认为这是“希望”,“这表达了我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可以”,还给我来了一封信。其实很简单,“您是否能够怎么样”或“请您怎么样”,那就完全两样了,这是很简单的语文知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语文教学绝不是看你教几个字、会写文章,它的意义远远要超出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语文教学仅仅看作应付高考,能够在将来写个履历,或者能充分表达意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可能太片面了,我们可能对语文教学的重大意义遗漏太多。

现今,教育的问题是我们一个很揪心的问题,非常揪心的问题。最近我碰到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女儿,据说她的事业做得很大,不过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穿得比一般人还要朴素。她说,我跟我爸讲,我们这些人将来是中国的中坚,很多事要从现在做起。她现在访贫问苦,赚

了钱去建希望小学,资助穷人。她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无非是小时候那几年教育的影响。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也有好东西,只是不普及。中小学教育搞好了,对人一辈子的影响实在很大。我们今天怎么做,对生活的价值取向,都跟中小学教育有关系。我想我们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我认为,教育观念变到这一步,固然有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但实际上从晚清开始,教育理念就有点走歪了。今天的变化看来是不可避免,似乎是必然的。

《论语》的第一章就是“学而”,“学而”讲的是人为什么要学习。我国古人向来有一句话,叫做“知书达理”,比方说《大戴礼记·保傅》里有这么一句话说:“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个里面的“小艺”,据后来章太炎先生解释,就是指“文字之学”,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小学”,里面包括文字,也包括做算术。那么“小节”指什么呢?章太炎先生讲“小节”指“洒扫、应对、进退”,这很重要。八岁的时候,从识字的时候开始要学会“洒扫”,我们古人讲“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你从小对身边的事情很苟且,很不认真;你长大以后,大事情交到你手上,你一定也苟且,一定很马虎。所以,这对一个人来说不仅是品格,用儒家的概念是“习性”,不是习惯,是习性,对习性的培养很重要。

“应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跟不同的人如何讲话,用什么口气。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学生的确不知如何与老师讲话。比如我自己带的研究生,已经30岁了,是个女生,有一次与我约好,下午要谈论文,因为她写博士论文时碰到了困难。可是,她突然对我说:“今天下午我要去办点什么事,我们改天吧!”我当时就有点火了,嗓门也大起来了,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老师与学

生约好的时间,是不能轻易改的,你有天大的事情,除非是你真的有事情必须去,否则的话你是不能改的。这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这是个师道尊严的问题。我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对你有意见,因为你已经读博士了,而且你已经30岁了,你将来还想当老师,你却连这个规矩也不懂,为了家里的一点小事,说要为妹妹去找一个工作,临时调换与老师约定的时间这是第一个不对;第二点,你有没有替别人着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换位思考,张老师有他的时间安排,他可能其他时间安排定了。我不得不用严厉的口气同她讲,只是希望她重视这个事情,没有其他意思。后来,她承认了错误,说:“张老师,我考虑得是不对。”诸如此类的“应对”,就是如何待人接物,这其实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或者说一个人的文明程度。

最后是“进退”,我的理解是,起码应知道什么事情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要上;什么事情应该让,应该退,不好的事情应该不去做,不要大家都去了你也去。这就是我们讲的古代“小学”里已经有的品德习性这部分内容。

那么,“大艺”就是“诗书礼乐”;“大节”就是“大学之道”。“大艺”,我们这里不说了。“大学之道”也就是《大学》里开头说的四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在止于至善”,我的理解跟德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家他们讲的一样,是“人的全面发展”。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指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社会,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人变成机器,人身上的无穷潜能无法得到全面发挥。我当时在德国,我看这样一个教育理想,与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教育思想,《大学》里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我知道,今天我还认

为,我们中国教育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将来找工作。

从近代起,中国教育 就向实用的方向转化

近代以来,教育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当然这跟近代的形势有关。因为晚清,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国家危亡,那么要救国的话,就不得不学西方。人们认为,学西方要见效的话,必须把旧式的那些东西取消,要建新学堂。所以那时的维新变法,建新学堂成为头等大事。当然,这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为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可能不学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我们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复杂,看似合理的东西,可能有很负面的一面。所以,我们站在历史长程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看得更远一些,看得更全面一些。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就向实用的方向转化,就是说以实用的方向为依归。

从民国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人明确地提出要以实利、功利的目的办大学,比方说当时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这么认为,大学就是以实用目的为主,要根据市场走,现在就有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南开大学有很多知名的校友,包括曹禺、周恩来,但南开的教育理念确实有问题。张伯苓跟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完全不一样,当然他们两人的背景也不一样,张伯苓是生意人出身,蔡元培是进士出身,很不一样。当时,以蔡元培为主的一大批教育家认为要以培养人格为先,包括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后来的蒋梦麟、胡适这些人。不管怎么样讲,他们都基本上认为,大学无非是首先培养人格,第二才是培养做学问的人。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德国哲学最了不起的一个大哲学家叫康德。康德一生真的把所有精力放在学问上，不结婚，不旅游。他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离他家格林斯堡 60 英里的地方，再也没有到过其他地方去。他一辈子就在那里看书，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下午 4 点一定要散步，所以小城格林斯堡的居民是以他散步的时间来对表的。后来，突然有一个星期他不出来了，人们问他仆人，你家主人是不是病了，还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仆人说，没有，在家看书。看什么书？看卢梭的《爱弥儿》。看完后，康德说，卢梭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做人的态度。他原来说他自己的性格是非常适合搞学问的，他就想当一个学者。他看了《爱弥儿》后，他说：我这一辈子的学问如果不能为维护人的尊严服务的话，我工作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工匠。这就是说，卢梭恢复了他对一个人做学者是为什么的思考。在这之前，康德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了，很有名了。可是他说，卢梭根本改变了他追求学问的态度。康德是一个清教徒，家里没有任何装饰品，唯一的装饰品就是一幅卢梭的像。我们回过头来讲，卢梭其实对西方的现代分科教育一直是有意见的，所以他在《爱弥儿》这部教育经典里提出如何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问题，即通过享受新的不同的教育方法来恢复人的本性。

但是，在蔡元培他们那时，形势比人强，最后这个声音渐渐变微弱了，以实利和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方针渐渐得到确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们个人真的无法抵挡，早晚会走到这一步。因此，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讲素质教育，实际上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因为在整个社会都认为人的教育必须服从市场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真正不把市场需

求放在心上的人，才会真心诚意地追求素质教育。

我们现在讲素质教育，很难，这有一个大的背景。暑假里，教委和我们复旦四五个老师有一个座谈，谈中学的教学。参加会议的还有格致中学、上外附中、复旦附中、进才中学等五六个上海顶尖中学的校长，大家一起谈这个问题。他们校长都说，很难做到，不可能做到。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升学率数字要统计，这跟学校今后怎么样都有关系，我们可左右不了。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仁心，每个人把自己这一道关。比方说，我跟学生讲，面包会有的，我知道你们要吃饭，要结婚，要成家，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考虑的东西。我只考虑你们要怎么做一个人，你们将来怎么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师，我教出来的研究生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专业都是过硬的，不会被别人牵头皮说，复旦出来的都是垃圾。我也会为你们去找工作，我也会为你去托人，但是现在我们不谈这些。

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讲，张老师不是天生当教授的，我年轻时觉得如果能找到月薪 24 块钱的工作，不需要父母养我就很开心了。但是，我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然而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不去学习啊！按照你们这样讲，我根本不应该在那里看黑格尔、读英文了，我应该到处找工作，托人走后门。我们那时比较傻，但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傻瓜才做得成。

不管怎么样讲，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在历史大背景下，教学，包括语文教学不得不跟着变。我们知道，民国有个很有名的提倡职工教育的人，我是不太同意他关于职工教育的观点的。职工教育可以搞，可是他不仅仅满足于搞这个，他当时写了一篇《实用主义商榷》，他把教育完全视为一

种人生的工具。他说：“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他说，教育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就像你出门要带点钱一样的，就培养这个。“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因为你要在家庭上、社会上立身，“于己”读了书以后可以自立不需要靠家长了；“于人”你可以对付别人了；“适宜之应付”就是可以应付世事了，就是这样一种教育思想。

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把各门功课应该怎么教，指导方针是什么，都归类了。最可笑的是，他认为当时的教育还不够实用，应该“全取应用”。他对当时北洋军阀时代的教育做了很大的批评，说这个教育没有用。语文呢？语文要“国文全取应用”，“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作文不要论事。然而在我看来论事是最重要的，培养一个人的判断力，培养一个人的是非感，培养一个人对世界的见解，全靠这个。他说不要，论人论事的题目都不要出。还有“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为什么呢？记物，你就把一样东西放在前面，让学生来描写，或者你就写一个风景。“尤多作书函”，尤其要叫大家写各种各样的公文。他不是说写信，底下一个括弧“正式书函”就是公文类的，不是私人类的。还有“便启，通告书”。另外，语文还要“拟电报”（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电报价目表等）。最后“习写各种契据式”，做生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契约要怎么起草。“书法注重行书”。我想，今天的语文教育都没有这样一个极端。对于历史的教学，他认为历史不要系统，你只要教一点什么事件就可以了，近代中国的事件你教一教，另外各行各业，你比方说商业，中国历史上有谁做生意做得特别好的你教一个，打仗

打得好的你教一个。完全采取这样一个割断历史的态度，把人当作一个工具，他居然觉得现在救国就需要这样。今天的语文教学，当然没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极端，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上语文课，对大部分人来说，包括学生、家长，甚至还有我们部分老师，认为上语文课有两个目的：一是人不能不识字，不能当文盲，识字当然需要语文课；二是考试，不论中考、高考都有语文这一门。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影响下，我们的语文教学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而且学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不过，在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民国有个教育总长叫范源濂，我觉得这个人在近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不亚于蔡元培，因为他也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他的教育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正确的。他当时就讲“按照现行学制，于小学教育应该留意儿童身心的发育，培养国民道德的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为宗旨”。我觉得，这完全正确。“于中学校，则规定完足普通教育，健全国民为宗旨”，这个我也是非常赞同的。“于专门学校，则规定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于大学，则规定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我觉得这都是正确的。说到语文教材时，他说，“其教材的内容常足以使生徒发生文学之兴趣及资以启发自得或兴起其美感焉”，就是要使学生对文学发生兴趣，另外还能启发他的智慧，第三个目的就是能使他产生美感。现在的学生，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美。昨天我对系里的研究生发了一通牢骚，我说你们女生，书嘛不读，去买那个指甲油。我在外国留学好多年，美国、德国和欧洲的各个著名大学都去过，没有一个研究生涂指甲油的，这说明你们心思不在这里啊。而且也不美，我们说学生的美其实就是素面朝天的，

这就最美了。

蔡元培先生当时以美学代宗教是有见地的。他也受了西方的影响,他说人生在世,不能完全向外的。人生向内,人的精神世界有三个东西:知、情、意。人有理智,为了给学习做计划;意志,人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还有个情。他说现代社会知和意已经完全被理性支配了,我是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我们完全服从理性。唯有一条,人的感情在现代社会怎么收拾,他也承认那种工具式的理性没有办法收拾人的感情。感情对一个人来说又非常重要,一个人没有感情这一面很可怕。他说这个东西历来是由宗教管的,他为什么不同意宗教呢?他说宗教太极端。历史上看,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砍杀,更不用说不同的宗教之间。因此,他不主张宗教出来陶冶人的情操,就提出美育代宗教,所以审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现在比方说我对流行文化有看法,不是说我站在一个文化贵族的立场上看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而是流行文化不能给人以美感,它把人当动物。所有的人扯起嗓子吼,挤在一起汗流浹背,人变得越来越粗野。所以公共汽车上大家礼让位子,大家谦谦君子再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国讲究诗教,温柔敦厚很有道理。语文很重要,孔夫子只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在《论语》上对儿子只有一个教导:“不学诗,无以为言。”就是说不学诗,你连说话都说不好。从字面上讲,就可见语文教学有多重要了。而且语文教学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美感的,一个人没有美感是很危险的,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

历史回顾完后,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我们应该怎么看教学,尤其是语文教学。语文教学从表面上看就是看书写文章,其实意义远不仅如此。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符号和工具,而是现实生活中重要的

一部分。国外的语言哲学家就直接说语言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语言的情况直接反映我们生活的情况。我们人类比单项能力的话,很多都比不上一些动物,可是在自然的环境中为什么人类胜出了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有语言,他可以把每一代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通过语言相传,而动物就不能把前辈的东西系统地总结出来发扬光大。人类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知识,而知识的教学是因为我们有语言。如果没有语言的话,人类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语言是文明的风向标。我们现在,比方说,什么人都是老师,然后张导、李导,还有什么马处、张局、刘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笑料。学校也是,很多的专业,很多的书都变成了很野蛮难听的简称。语言的复杂是反映了文明的复杂,很多复杂的东西是不能简单的,一简单是要出问题的。语言反映的是最微妙的东西,你把它一简单就没有办法。中国语言第一讲究简洁,然后是内在的有力。内在的有力,通过韵律和句式表达出来。一个人既然说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做个作家,那应该对此有所研究,怎么能写出像文学青年这样的语言来。还有比方说,在大学里面作为一个被学生喜欢的老师还是很有意思的。学生会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你看,还会说老师你忙的话就不用看,我只是想让你老师了解一下,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有时候也会给他们讲讲,但总体上来讲,现在的学生原著读得太少,经典读得太少,他们大量的表达词汇是从网上来的,从武侠小说里来的。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久了,连教授之间、部长之间讲话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原来知识分子举手投足间使用的很普通的话现在都不用了,连原先白话文里的一些话都不用而去用这些词。有的同学听了我的话,开始改正,有的是一开始就抵

制这些的,当然还有的同学还在用这些词。

所以我认为,教语文不仅仅是教语文,而是教人文的一些基本要素,它不能不是一个关乎人文的事情。总而言之,语言是反映社会文明的指标。现在很多学者和港台的学者接触了以后觉得我们的确差一点,为什么?文言文的程度差了一点,台湾联考的语文卷子要比我们难得多。难是比这里难,但水平也一直在下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身处这个时代。

不能把人文朝动物性上引

人文精神现在谈的人很多了,但什么是人文精神,我觉得不要把它理解得太复杂。如果人可以定义的话,我认为人就是有人文性。我们如果讲人性的话,就是讲人文性。我很不同意文革以后讲解放思想,就把人性朝动物性上引,把所有的男女之爱,甚至更出格的第三者、第四者,定义为这是人性的解放,我是不太同意的。的确,男女之情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人性的所有方面,把这个东西作为唯一方面,那更是错的。

那么,什么是人文?现在一般人把人文和自然作为相对的东西,一边是人文,一边是自然。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人文”,中国最早出现在《周易》上。《周易》上说:“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古人最早主张“天人合一”,企图把人文与自然统一起来。人文、人文,关键在“文”,不是“人”。“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文”是什么意思呢?《周易》上说“互相杂,共曰文”,“文”就是事物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文”最初指玉石上的纹理,后来变为指事物交叉的关系,由这两个基本的意思引申出制度、秩序、条理的意思。所以,“人文”的基本意思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关系,

即条理、秩序和道德。但是,它与其他的关系不一样。这种关系、条理、秩序是隐性的,它不是明文规定的制度,而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比方说不能虐待老人和小孩,没有人写在哪个条例上,当然现在有刑法,但是基本上几千年来大家不写,可是无论古今中外,大家都认为是天理,是不要讲的。你违反了,你不齿于人类,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文背景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谁的规定,而是人类长期生活的自然产物,就其绝对性而言,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天理,违反了这个东西,就是伤天害理,就不能算是人。

人文首先指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但它也是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当然之理,或者说,人总是把自然纳入到人类社会来观察,来看待。中国古代“阴阳相生”、“天人感应”的思想,恰恰反映了这一点。所以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有把宇宙的大生命和人类的小生命视为同一生命的思想,其根据也正是在将自然与人文视为一体。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在我们中国,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其实是《赤壁赋》。《赤壁赋》反映这样一种思想:人死,没有什么关系,人都是要死的,宇宙间所有的东西都要灭亡,可是当你个人的小生命融入到自然的大生命当中,你就跟它一样的壮美,一样的永恒,一样的不朽。我们中国向来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人和自然是一体的。总而言之,人文精神是支配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当然之理。它不同于道德,道德是一种指导人的行为的准则,道德规定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规则,划分我们欲望和行为的界线。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此而言,道德当然是属于人文精神,但它还不等于人文精神,因为道德本身还需要鉴定,而道德的实施又不是康德所设想的那样,具有循序的

绝对性,而需要有一定的规定。人文精神就是这种原道的规定。

人文精神不是行为规范,而是设定行为规范的最后标准,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天理良心。有些事情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就会说这是伤天害理的或者是正义的,这是人文精神使我们做出这种当下的判断。人文精神当然要体现在一定的行为规范当中,但是它和道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某种程度上它比道德还要虚。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所攒下来的人之为人最可宝贵的一些原始的价值和基本的人伦底线。现在人类掌握了很多毁灭自己的致命的手段,如果人类把人文精神放弃的话,人类哪一天擦枪走火毁灭自己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人文精神在世界范围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表现的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在德国,1988年的时候,我看到他们60年代做过一个问卷调查:捡到钱包要不要交还失主?当时70%的人说要还的;90年代以后同样的问卷,70%的人说应该归自己所有。在中国,我就觉得人心很危险。90年代初期,我回国的时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做过一个调查:婚前要不要财产公证?当时所有的人都愤怒地拒绝,认为结婚是很崇高的事情,这样结了还有什么意思。同样的调查在90年代末,99%的人说当然要公证啊,要不然以后讲不清楚。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搞个明细表的话,恐怕一本800页的书都不够。时间使人对事情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人的看法,变得这么快,变得离人性越来越远。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开始讲要人文精神,因为有一部分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很危险了,如不回归,人类世界就将变得没有人的味道了。

人文精神跟我们的语文教育关系尤其密切。西方的教育思想确实把实用的方面

放得越来越靠前,斯坦福的常务副校长在80年代就公开地说过学校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当时的罗伯特·贝拉(美国有名的社会学家)在一本很厚的书里谈对美国现状的看法,引用了这句话后说:这种人来掌管我们的教育,美国的教育还会好吗?可是没有用,教育就是这种人在掌管。现在有些人开口普林斯顿,闭口哈佛,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办学思想。我去年在岳麓书院讲过学,岳麓书院因为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从事革命的地方,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他们的办学章程都是一代又一代刻在石碑上。我看到一块乾隆时代的石碑,他就说到我们的学生要关心实务。我原来孤陋寡闻,以为实务是维新变法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到湖南办实务学堂才提出的。没想到这个概念是从乾隆时代先辈那里找来的。要关心实务,要注重物理,要注重大自然的很多东西。在民国时期,为了抗拒或者说有意识地冲淡西方来的教育制度,一代又一代伟大的学者,如熊十力、梁漱溟、唐文治、马一浮,他们都在各地办书院,弘扬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理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口闭口哈佛?中国伟大教育家的思想,比外来的那些半生不熟贩卖来的思想深刻得多全面得多。自己家里还有家当,不要妄自菲薄。如果现在的大学校长张口哈佛,闭口斯坦福,中国就不会搞出一个中国的哈佛来的,太没有志气!

西方教育至少他们表面上说教育是培养人格的,我们的教育现在几乎不谈这一点。民国时代,中学是有修身课的,现在大部分学校是没有的,好像复旦附中有,即使有也是把它当点缀,没有当回事。我们的教育只管学生的脑,不管学生的心。所以,现在的学生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知识没有文化。有一次天很热,一个研究生跑来上课衣服一脱,穿个汗背心。我说,你给我赶快

穿好,不然你就走人。后来,我跟他讲我们中国文化是衣冠文化,衣服穿得好不仅仅是对别人尊重,首先是对自己人格的一个提升和尊重,你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像个什么样子。还有我说:你们不要穿拖鞋来上课,这个不好,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也是对同学的不尊重。这些事情虽然是小节,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些小节是有道理的。小节不讲,大节一定不修。

不只要教语言,还要教文明

现在很多同学往往会好几门外语,可是中文说出来却很粗野。我孩子的外语一直是市里得奖的,自以为是,说我认识的字比你多多了。我当时笑笑说,词汇多只是一个指标,外语真正好不好要看他写出来的外语典雅不典雅。他(孩子)不服,我把陆谷孙先生的东西给他看。他看后大服,羞愧得无地自容。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英语好,陆谷孙先生的中文就好得不得了,对英语的理解就那么到位,所以我孩子现在再也不谈自己英语好了。

我们现在语文课也是这样,我们不光教语言,而且要教文明。在没有修身课的情况下,我想是否我们语文课在教语文的同时也教做人的道理。我虽然没有当过语文老师,但我想这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同学说话比较粗野,是不是可以向他指出要他换一个词汇。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什么是典雅,什么是优美,慢慢地就会改变他的气质。我认为,语文课本收录的课文应该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这是我们教育学生最好的一个抓手。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传播很多关于修身方面的理念。修身课本身过于正经,反倒是语文课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是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每个月有3小时跟学生在一起,我喜欢跟他们谈诗论文。有一次读到中学生必读书目时,北京的叶廷芳先生,上海一个师大的中文系教授,他们同时提出经典也有时效性,要与时俱进,《哥德对话录》应该拿掉。我当时大怒,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荒唐。叶廷芳先生对德国文学可以说是第一把手,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哥德对话录》我不止看过一遍,这是太好的一本书。

我觉得,语文课老师有许多方面可以做。不仅仅如此,语文文本是我们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同时也影响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语文教学必然会涉及世界观的问题,我自己小时候受过的有限的语文教育就比我青少年时期受的教育对我的影响还要大。我说的世界观是更偏重哲学的意味,我认为世界观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哲学的看法。那什么是哲学?很多人有误解,认为哲学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之学,好像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哲学是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世界上有一百个哲学家就有一百个对哲学的定义,以致于德国大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这非常对。哲学是来自人生而不是书斋,而人生在世,必须要面对这样三个问题: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中学生已经开始对这样的问题有意识了,其他的科目没有办法对这些问题直接有所涉及。有一次,我在复旦大学演讲完,一个女生说她是育才中学哲学兴趣小组组长,当时她发誓说她第一志愿是考复旦大学哲学系。她还问我能不能去他们学校演讲,可见他们已经有这个意识。语文课的课文多少都会涉及这个问题,就看老师能不能将它们发掘出来

加以引导。法国中学就是有哲学课的，考大学也是一门必考的课。中国没有哲学课，伤害很大。

我讲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语文要考虑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考虑？现在我们同学的精神发育非常不平衡，有些方面表现得非常世故、非常老练，有些方面却非常无能。这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关系。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鼓励一个人到外面世界上去争，去杀，不像任何一种古代的文明鼓励你用一段时间静静地面对自己。因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一个面对自己的文化。你看整个文艺作品也好，奖励机制也好，都是叫人外向的。同学们在这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多，很多同学都写信问我能不能和我谈一下心。我知道他们很苦闷，他们没有朋友，不像我们。那我们怎么办？这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古代圣贤，比如前面说的范源濂就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就是要把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精神教给学生，让古人伟大的精神和人格来影响后人。我现在看《史记》，看《汉书》，看看我们的祖先活得这么顶天立地，这么光明磊落，而我们现在为了一点小事就要死要活，人品上萎缩得不得了。这也是全球性的现象。

还有一个，今天的世界太混乱了，没有是非。我们的奖励机制就是要人们去斗争，今年只有一个高级职称，你怎么把对手干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什么人格都不要了。归根结底，是社会体制的问题。我们中学要把好关，告诉同学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東西，人与人之间除了这个，还有高山流水、钟子期和俞伯牙的这种关系，还有把身家性命投给朋友的关系。人生追求的不仅仅是蝇头小利。我说有两条路：一个多读读书，夜总会少去。另外，多交能让你上进

的朋友。如果在中学时代，我们不跟同学讲清楚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如何跟他人打交道、人如何跟自己打交道、人如何善待自然，那么，他们走上社会，如何生活？现在绝大多数的同学对这个是没有准备的。比方说，今年一个本科生跟我说：张老师，我在大学四年什么事都不想干，不知道考入大学后还要干什么。他们从小学开始有目标，考考考，考进大学后就茫然了。我说你不要急，自己去找方向，慢慢就能走出一条路来，不然永远在原地打转。如果在中学没有加以好的引导，我们怎么让他们进一步地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下辈子能托生个中学老师，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是我的心里话。

另外一点，要培养他们的哲学思维，也是通过语文教学。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水平真的是很低，你可以看到，前几年，国家出面，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写要讲诚信，可是他说不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诚信。评论就说去年我们国家因为不讲诚信损失了四千四百几十个亿，他是把经济上赚还是赔来作为诚信的标准，那岂不是说只要我赚四个亿，我就可以不讲诚信了吗？他犯了一个错误，把不同类的东西放在一起说明问题。这是基本的一个错误。我们国家这样思维水平的笑话太多太多了，在官方的文件中，在政府的政策中，在各种各样的举措中。我们的同学与西方的同学比，在思维这一点上，真是太粗糙太简单。那么，这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写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怕写文章。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最大的享受是写文章，写给自己看。连个桌子都没有，趴在床上，我就在那里写。我觉得自己现在还能写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我跟自己的学生讲，写作是很愉快的事，你们为

什么不愿意写？写作锻炼人的思路，锻炼人的见解，还有锻炼人的判断。一个人思维要清楚，第一个要判断，因为你讲的道理要有道理；第二，这个道理是不是一个真道理；第三，这个道理是不是想得比较深，然后你一步步地论证，而论证要通过讲道理。中国这个社会为什么是一个不太讲理的社会，因为它的文风、文章当中不太讲道理。中国文言文的表达，不像西方的语言。它们的语法，便于带各种各样的从句，而文言文讲究精炼，它的从句结构几乎是没的。从句结构没有的话，就点到为止。现代的白话文引进了西方的句式，这是好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想不深，那么现在能不能通过语文教学，让同学对同样一件事想得比一般人更深一点。我一直举这个例子：下棋高手下一步看十步，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当前的问题也在这里。我说，第一，你们要写；第二，把自己想到的东西环环相扣，严密地一步一步推理论证出来。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需要做。包括我们哲学界写的那些文章，我看了很多，天晓得，没有什么论证的，你怎么能说服人。这种东西，你写出去，人家外国人当然不要看，认为你这不符合要求。这一点，在中学里就应该培养。

最后我还讲一点。语文课的课本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语文教学除了让学生具备掌握语文文字的能力外，更应该让他们通过语文课，进入人类文明的宝库。今天人类文明有丧失的可能之说，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记得90年代初，我在美国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次，系里的一个教授带我到她家去做客。她的丈夫是英语系主任，她是哲学系的，

又是美国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在路上，她跟我说要快点回家，因为他们请了一个管孩子的人，每天5点就要离开的，是个中国人。他是在美国读生物的，找不到工作，临时在他们家打打工。她无意中说起，她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有兴趣，问他一些问题，结果他一无所知。她看我脸色不太自然，就解释说：你不要过意不去，那是全球性的现象。我在剑桥读博士的时候，做过助教，问全班五十多个人谁读过拜伦和雪莱的，结果只有十几个人。现在我在复旦，问二三年级的学生，三百多人，谁读过《荷马史诗》，结果一个人都没有，让我非常伤心。我觉得中学语文老师就是宝库的领路人，要让他们知道《荷马史诗》至少应该比金庸著作先。中学老师还应该是高级营养师，能够告诉学生什么是营养丰富的食品；什么是垃圾食品；什么是优美和高尚，什么是丑陋和低俗。语文课的学习，我们宋儒有一句话叫“改变气质”，学生能够改变气质，同时也能改变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还后悔有个细节我没有纠正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有两个空位子，一个男生问我可不可以坐，我让他坐下来。上课后，有两个女生进来，想坐在一起，他不让，结果一个女生只好坐到后面了。我想，当时应该让男同学起来让座。你作为一个男人，谦让弱者应该是的，这个在西方和东方都是如此。孔夫子就把“让”看作最大的一个道德，你小伙子一个，还读什么圣贤书。这是对他其他人一个很好的教育。现在的学生给我的感觉就是文明程度不够，现在我们的教育只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文明的教化。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教育最初的目的都是文明的教化。

（说明：这是张汝伦教授在天津语文教学研究基地所作的一次报告的整理稿，已经作者审定。）